

《甲寅日刊》的发行始末及若干问题探讨^{*}

李相九^{**}

<目 录>

1. 导论
2. 《甲寅日刊》构成与同人问题
3. 《甲寅日刊》发行时间问题
4. <甲寅周刊出版预告>问题
5. 结论

1. 导论

民国时期以“甲寅”为称的报刊，通常是指从1914年到1915年发行的《甲寅杂志》，而参与发行的群体被称为“甲寅派”，他们在民国时期的政治思想成为主流。1) 但是，从1925年到1927年为止发行的《甲寅周刊》也被称为“甲寅派”。所以，“甲寅派”有“前期甲寅派”和“后期甲寅派”之分称。《甲寅杂志》与《甲寅周刊》是按照历史的状况，标榜同人们的政治思想立场代辩的政论杂志，常常论及政治思想界的分歧。2) 但是，两者发行之间有了1917年发行的《甲寅日刊》，

* 本文以本人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章士钊建立近代国家的构想与实践——从《苏报》到《甲寅》前期(1903-1917)”中的部分内容为基础修改而成。

**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专门员

1) 如《甲寅杂志》在<本志宣告>(《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中所表明的“无社员与投稿者之分，任何意见，若无背於本志主旨，皆得发表，惟所主张”，由于在当时还不知名的各界人士的参与而脍炙人口。其中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梁漱溟等当时很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说他们通过《甲寅杂志》成长为思想界的主力军。

2) 参阅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该文分析了《甲寅》由

所以可以说，民国时期“甲寅”经过总共3次、3种的发行形态。而且3次甲寅都是以章士钊(1881-1973)为主编，不仅发行形态，还是发行时期的差异，都包含了三个不同历史性质。

首先，《甲寅杂志》的创办背景是，1914年5月为打倒袁世凯独裁行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聚集于日本东京的革命派人士们接受多样政治意见，号召组织了欧事研究会，创办《甲寅杂志》作为其机关报。³⁾因此《甲寅杂志》是民国初期知识人多样思想的公论之场，尤其是参与《甲寅杂志》的同人成为以后的《新青年》、《太平洋》、《学衡》、《新月》等民国时期重要政论杂志的主要同人。所以，《甲寅杂志》的历史地位应该是民国时期知识人公论交流的一个出发点。

其次，与此相比，《甲寅周刊》是段祺瑞军阀政府的章士钊在变成代辩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立场后的1925年发行的。⁴⁾当时，代表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阵营已经是思想界的主流，章士钊主张“农业立国论”、“代议非易论”、“恢复科道制”、“礼教复兴论”等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于是发行了《甲寅周刊》。⁵⁾当时章士钊互相比较了自己十几年投身中国的共和制的经验，且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他主张一种适应中国现实的修订共和制。

因此，《甲寅杂志》是章士钊主编的包含知识人多样政治见解的以“公论之场”为称呼的“甲寅派”，相反《甲寅周刊》是以章士钊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甲寅派”，其性格可谓大变。⁶⁾那么其变化的线索在哪里能找到呢？1917年《甲寅日刊》从发行到停刊的一系列事件成为我们寻找变化线索的关键。

来的“前《甲寅》”和“后《甲寅》”，或者“前期甲寅派”和“后期甲寅派”的差异，探讨了其“政论文派别”还是“思想文化派别”的性质，指出前者主张“政治调和”，后者主张“文化保守”。

- 3) 关于欧事研究会，参阅李相九，〈二次革命 이후 革命派의 분열과 欧事研究会〉，《历史学研究》58号，第253-279页。
- 4) 1924年11月章士钊被任命为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1925年4月被兼职为教育总长。（参阅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6-161页。）
- 5) 关于《甲寅周刊》的研究，与《甲寅杂志》一样多，代表性成果是“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
- 6) 田寅甲，〈东方文化派와 章士钊 -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에 관한 연구노트〉，《人文学研究》7集，2004。：他不分“甲寅派”，当指称以“后期甲寅派”为“甲寅派”，认为是20世纪2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的通称“东方文化派”的一种。

《甲寅日刊》是标榜了1915年《甲寅杂志》停刊后以章士钊为中心，李大钊、高一涵等参与的政论杂志，其形态是日刊。袁世凯死后，政治接连混乱，出现了1917年4、5月的“府院之争”和7月1日的“张勋复辟”等剧变，这为杂志企图提出“调和与妥协”的解决途径提供了背景，开始再现公论舆论。⁷⁾然而，除1917年国内政治混乱以外，国外状况也发生剧烈变化，美国参战扩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加之俄国革命等事件，所以《甲寅日刊》同人之间的意见差异无法调和，导致停刊。所以，《甲寅日刊》与《甲寅杂志》、《甲寅周刊》不同，集中表现了民国时期政治思想的一个转向过程，具有重大的资料价值。

然而，国际学界无论对“甲寅派”的前后期的划分认识，还是通过《甲寅日刊》来分析民国时期思想的转换意义，都缺乏充分研究。其原因是《甲寅日刊》的发行时间短，历史价值未能受到瞩目，且受制于资料难找。尤其是因为搜集《甲寅日刊》原本的困难，《章士钊全集》、《李大钊全集》收录的也是在商务印书馆1922年(1928年再版)《甲寅日刊存稿》上整理的他们的政论文。因此这段时间《甲寅日刊》发表的相关论文也收入章士钊或李大钊的《全集》中。⁸⁾

关于《甲寅日刊》时期李大钊的政治思想，有吴家林的《从《甲寅日刊》看李大钊的早期政治思想》⁹⁾，他从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的70余篇文章中进行了筛选分析，是关于李大钊在全盘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思想发展阶段的研究。另外，郭华清的《调和为国：章士钊在《甲寅》日刊时期的政治思想》¹⁰⁾阐明了关于章士钊《甲寅杂志》时期主张的调和论在《甲寅日刊》时期从多种不同方面进行的尝试。

章士钊、李大钊都是《甲寅日刊》的重要同人，但是《甲寅日刊》不只刊登两人的政论，所以关于《甲寅日刊》报刊本身的研究值得重视。因此，《甲寅日

7) 在《甲寅日刊》上从1917年3月12日到28日，章士钊提出“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事务员问题”，将各界著名人士的意见登载为17篇文章。

8) 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1-10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吴家林，〈从《甲寅日刊》看李大钊的早期政治思想〉，《齐鲁学刊》1984年第5期。

10) 郭华清，〈调和为国：章士钊在《甲寅》日刊时期的政治思想〉，《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9月。

刊》对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新闻报刊史、章士钊、李大钊等十分必要。

笔者在研究章士钊这个中国近现代史上艰难曲折的人物的思想与活动的过程中，努力找到《甲寅日刊》的实体资料。结果，笔者在北京国家图书馆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资料室等找到了《甲寅日刊》的缩微胶片一部分。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查明了《甲寅日刊》的历史实际，提高资料利用价值。

鉴于此，本文在分析既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第2章检讨《甲寅日刊》的政论、广告、新闻、发行人等报刊体制与同人面目，阐释既往研究没提到的《甲寅日刊》实体资料的真面目。第3章通过反思既往研究关于《甲寅日刊》的发行时间问题，重新定位了实际的发行时间，揭示同人们渐渐脱离的过程以及《甲寅日刊》的性质变化过程。第4章主要检讨同人们如何克服日刊形式政论杂志的弱点，通过《甲寅日刊》中〈甲寅周刊出版预告〉来分析《甲寅日刊》难以为继的原因，以此检讨既往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2. 《甲寅日刊》构成与同人问题

《甲寅日刊》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由甲寅日刊社负责发行，陆鸿逵任经理，负责财务，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人负责各种政论文的发表。主要的新闻报道由邵飘萍主持的北京新闻编译社负责接收报道材料并编写成新闻。

自创刊号开始至6月4日为止，一版上标注了“今日正附两张”的标识，包括广告共有6版，之后都改为标注“本报今日大一张”共4版构成。报刊版数的减少，可列举出多种不同的原因，在《甲寅日刊》6月5日的〈本报特别启事〉中说明了“本报数日以来，销数陡增一倍印刷甚为困难，暂将附张停刊，俟布置周备再行续出此启”。¹¹⁾

11) 〈本报特别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6月5日，第2版。

从中可以看出，销售量增加的原因是自6月开始政局变得极为紧张，因而读者们对政治的关心也大大地增加了。然而，如所阐述的，甲寅日刊社直接提高印刷数量非常困难，暗示了经济上的原因等可能发生的内部问题。对这一问题，可能会简单理解为报刊构成的变化，但从该报刊发行的同人们的立场来看，却是问题重大。其中隐含了《甲寅日刊》的发行及运营相关的重要意义。

《甲寅日刊》继承了《甲寅杂志》的宗旨，是评论政治问题的报刊。因此，在《甲寅日刊》的头版头条刊登的必然是一篇政论文，大致分为〈社论〉、〈论说〉、〈言论〉、〈论评〉、〈代论〉等形式，是对当前的政治现实进行批判或建议，另外内容上则都以章士钊的政治主张“政治调和”为基调。从1917年1月末到5月末，政论文主要以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的文章为中心。然而，高一涵在回忆录中提到，“民国五年，章到北京，将《月刊》改为《日刊》，邀余与守常同任撰述”，自己和李大钊著述了大部分的政论文，又提到“谁知章士钊已早与政学系、研究系相亲近，余与守常每有批评该两系主张时，士钊有难色”。¹²⁾

事实上，《甲寅杂志》时期，章士钊理论上主张“政治调和”，而《甲寅日刊》时期可以说是他为调和论付诸实践而努力的时期。因此恐怕正如高一涵所说的一样，章士钊努力“与政学系、研究系亲近”。当时，袁世凯死后各政治势力重新聚集北京，如同民国元年、二年一样再次出现政治混乱的局面。另外，这一时期章士钊以参议员的身份加入国会，¹³⁾通过政治演说为各政派的调和而努力，可以说《甲寅日刊》在剧变的政治现实环境下，是提出各种调和方法的试验台。

这一时期在他的调和论中有几个问题尤为突出，特别是就对德宣战问题，他通过发表〈加入欧战问题之意见〉、〈反对政府外交政策者应有之觉悟〉、〈临崖勒马之外交〉、〈愚之外交政策观〉、〈外交总长问题〉、〈约法上宣战同意之解释〉等政论文，多次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另外，就“国体问题”、“宪法问题”的

12)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中央日报》附属《中央副刊》第60号，1927年5月23日。（载董宝瑞，〈李大钊的文坛好友高一涵〉，《党史纵横》2003年04期，第18页。）

13)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第162页。：“护国战争之后，作为护国战争的一项成果，国会恢复了。原来的有湖南推举的几名正式参议院中，胡瑛因参与帝制活动被革除议员资格，湖南省就另选章士钊为参议院顶替胡瑛。”

相关问题，也在通过发表〈国教问题〉、〈一院制之主张〉、〈理想之一院制〉、〈议会之品格〉、〈参议院减少名额之主张〉、〈创设特别国务会议增造不管部之国务员议〉、〈论解散权与不信任投票〉、〈国务总理之任免与副署问题〉、〈论行政裁判〉、〈论同意权〉等¹⁴⁾，继续为调和论的实践而努力。

《甲寅日记》的第一版的下半版面一半左右都刊登各种广告，如《丁巳杂志》、《新青年》、《太平洋》、《亚东新闻》、《言治》等，大部分都是政论杂志和报刊的广告。《甲寅日记》不只刊登了以上提到的广告，同时也刊登了多数书籍出版的广告，这些只不过是短期刊载的广告而已。但是，《新青年》和《太平洋》的广告不仅包括了出版预告，还有各出版刊号的目录等详细的内容，一直到6月30日进行了连续的刊载，可以说与《甲寅日记》有着非常特别的关系。首先，《新青年》的主编陈独秀是章士钊的老友，另外《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也都曾参与了《甲寅杂志》，从这一点来看两者间的关系非同一般。¹⁵⁾特别是1917年6月一个月期间在《甲寅日记》上刊载的《新青年》广告第3期第2号的目录中刊载了章士钊的一篇演说文。¹⁶⁾

《太平洋》是由李剑农主笔的政论杂志，其主要的撰稿人“为《甲寅》分出之英法派人所编辑”¹⁷⁾，实际上《太平洋》和《甲寅》政论的内容和方式类似。¹⁸⁾章士钊和《太平洋》的主要撰稿人大部分有留学英国和法国的经历，《太平洋》的主要同人在留学时期已经有参与《甲寅杂志》的经验，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他们在很早就受到章士钊的影响。如同郭双林所表明的“《甲寅日记》时期，以李大钊、高一涵和李剑农为主将的“前期甲寅派”才最终形成。”¹⁹⁾这是因为该时期创刊

14) 关于这时期章士钊的政治思想，参考郭华清，《调和为国：章士钊在《甲寅》日记时期的政治思想》，第37页。：他主要分析的是章士钊关于“国教、省制、国会体制、国务院副署、同意权”问题上，提出调和思想，但他的评价是“章士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15) 参阅胡峰，〈《甲寅杂志》(月刊)：孕育《青年杂志》的母体〉，《齐鲁学刊》2009年6期。

16) 章士钊，〈经济学之总原则——在北京学术研究会之演说〉，《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1日。：整个《新青年》里只有这一篇章士钊的文章，但是《章士钊全集》没有收录。

17)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3页。(《民国丛书》第二篇49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18) 陈友良，〈民初知识分子与政论——以《甲寅》、《太平洋》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第123页。

19) 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第153页。

《太平洋》的李剑农日后在思想和政治活动上，与章士钊有着最多的共同点。

第2版和第3版是新闻的形式，以〈紧要新闻〉命名，刊登10条左右简短的新闻报道，接下来刊载相对较长的政论文形式的新闻报道。除此之外，〈命令〉项目刊登每日的大总统令，另外还刊登〈东方通信社电〉、〈路透社〉及〈冠盖往来〉等的消息，有时也通过〈时评〉增加政治评论。《甲寅日刊》是日刊形式的办刊，因而每天刊登的最新新闻报道其重要性不次于政论文。

《甲寅日刊》的主要新闻报道，由邵飘萍主持的北京新闻编译社负责提供，关于邵飘萍，章士钊提到“邵振青以字行，为文别署飘萍，浙江人也……民国四年愚违难东京……振青以时来会，温温一美好少年，未见其多所发抒也。”²⁰章士钊在发行《甲寅杂志》于日本东京初次结识了邵飘萍。章士钊接着又在回忆中提到“后二年，愚至京师，复《甲寅》为日刊，振青渐审性行与新闻记者弥近，续续以小文求揭报端，清通简要，雅善讥弹，信良器也。一日与谈新闻策要，吻合愚意，适愚以事返湘，经理陆鸿逵亦相偕去，乃倩振青便宜为董日刊，于是者半年”。²¹再说明一下，邵飘萍作为《甲寅日刊》的新闻记者参与报刊的发行，甚至在经理陆鸿逵离开后的半年时间里负责了新闻社的运营工作。因此，邵飘萍不只是《甲寅日刊》的主要成员，也是对新闻报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新闻编译社的设立时间，邵飘萍自己在1924年发表的对于新文学的两篇文章里也产生了混淆，写了1916年、1918年两个时期，²²这使学界发生了分歧。戈公振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报学史》中提到“民国五年(1916年)七月”²³，方汉奇则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中提到“1918年7月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²⁴，伺候不少研究者各执一词。孙晓阳一方面根据《顺天时报》1917年7月16日刊登〈复社广告〉，认为“编译社在张勋复辟时被迫停社数日，并于1917年7月15日复社”，否定了1918年创办之说。另一方面，他根据《顺天时报》

20) 孤桐，〈书邵振青〉，《国闻周报》1926年7月18日。（《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44页。）

21) 孤桐，〈书邵振青〉，1926年7月18日。

22) 孙晓阳，〈关于邵飘萍的几点考证〉，《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6期，第168页。

23)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268页。

24)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737、742、743页。

1918年8月18日刊登又一条广告，“编译社两年以来，专发行北京兹以外各报，时间推算，两年以来当指1916年”。²⁵⁾但是，笔者判断“两年以来”可指1917年和1918年这两年。

在《甲寅日刊》中，邵飘萍曾多次介绍了自己的新闻编译社，从1917年5月8日到18日连续发表的《新闻编译社成立披露》²⁶⁾中表明了“启者敝社宗旨，在供给真确新闻材料助报界之进步诚办数日成绩昭著承中外报纸多数采用者，兹于五月一日正式成立，每月仅收纸墨油印费十五元，欲采用者请向敝社订购可也。”由此可以看出，邵飘萍明确阐明了新闻编译社设立的时间，而且这体现出新闻编译社设立的当事人、当时记录的价值。

然而，实际上，在此之前从2月23日到2月28日连续发表的《邵飘萍启事》²⁷⁾中提及了收集新闻材料的时间“日阅电话南局二八八二号晚七时至十一时电话南局一九零六函件概寄前门外五斗口石猴街六号口寓收”。由此可见，《甲寅日刊》创刊初期已经以记者的身份为《甲寅日刊》提供报道材料了。这样，《甲寅日刊》通过与邵飘萍设立的新闻编译社的合作，更快地相互传达新闻信息。

而邵飘萍作为《甲寅日刊》的同人，发表了3月31日《第三步实行之前提》²⁸⁾、4月13日《华工问题》²⁹⁾、4月14日《解决外交宜开各界联合大会议》³⁰⁾等《社论》或《专论》，可以了解到在读者的要求下阐明了其政治立场。因此，他在《甲寅日刊》的各处都表明了自己作为新闻记者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新闻。宣传新闻编译社成立的广告，再加上经常在《邵振青声明》³¹⁾中单独发表声明，“近日政界友朋，颇有以鄙人是否列名某会某社为问者，鄙人职司新闻记者言论行动，绝对不受一派之拘束，亦从未列明党籍，恐有误会再声明”，表明自己政治上的中立性。此后，又于6月22日发表的《来函照登》中可以了解到“鄙人对

25) 孙晓阳，〈关于邵飘萍的几点考证〉，第169页。

26) 邵飘萍，〈新闻编译社成立披露〉，《甲寅日刊》1917年5月8日，第1版。

27) 〈邵飘萍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2月23至28日，第1版。

28) 飘萍，〈第三步实行之前提〉，《甲寅日刊》1917年3月31日，第1版。

29) 飘萍，〈华工问题〉，《甲寅日刊》1917年4月13日，第1版。

30) 飘萍，〈解决外交宜开各界联合大会议〉，《甲寅日刊》1917年4月14日，第2版。

31) 邵飘萍，〈邵振青声明〉，《甲寅日刊》1917年5月8日，第1版。

于政治绝无关系……惟既司记者之职，依事实之发生为记实，在真相而已。”³²⁾他一方面是《甲寅日刊》的同人，另一方面为真实地报道充实的履行其新闻记者的指责。《甲寅日刊》由于邵飘萍的如此积极而中立的态度，确保了新闻报道的准确而迅速。

陆鸿逵既是《甲寅日刊》的发行人，同时又是经理，由于当时章士钊等《甲寅日刊》的同人们比陆鸿逵年轻，因而陆鸿逵可以称得上是“报界断论老手”。³³⁾事实上，陆鸿逵作为《甲寅日刊》同人的这一点，只是通过他在离开《甲寅日刊》时发表的声明中可以确认。陆鸿逵在1917年6月29日和30日分两天发表的《陆鸿逵启事》³⁴⁾的声明中写道：“启者鄙人，刻已移居天津，自本日起与报脱离关系，所有本报内一切经手款项均已结清并无亏欠，特此声明”，由此可见他是与《甲寅日刊》有着直接关系的人物。

然而，在除《甲寅日刊》以外的材料中，很难找到陆鸿逵的相关内容。但是，他却是章士钊最早发表近代思想的报刊——《帝国日报》的创办人。同时，他也是《甲寅杂志》在日本东京发行时期的发行人。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他是《甲寅日刊》的发行人。但是，他在《甲寅杂志》中使用“渐生”³⁵⁾笔名发表政治意见，³⁶⁾所以不可能在《甲寅日刊》上寻找其信息。

然而6月30日发表的声明指出，发行人陆鸿逵与《甲寅日刊》“脱离关系”，即便如此《甲寅日刊》当时还没有停刊。因为连续两天刊登了陆鸿逵的公告，还有《陆哀的启事》³⁷⁾。陆哀准确地到底所指何人，现在很难确认。只是由于他发表的声明中表明“启者鄙人，自本日起接充本报总理，所有本报以后一切事务，概由鄙人负责，特此声明”。毫无疑问可以确定是接替陆鸿逵负责运营《甲寅日刊》的人物。前文中章士钊介绍了邵飘萍，如其表明的“振青便宜为董日刊，于是者半

32) 邵飘萍，〈来函照登〉，《甲寅日刊》1917年6月21日，第3版。

33) 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历史研究》2009年第3期，第177页。

34) 〈陆鸿逵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6月29、30日，第1版。

35) 杨琥，〈《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第176-178页。

36) 笔名“渐生”是〈约法〉(《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开始，全《甲寅杂志》中21篇，章士钊以外最多。(参阅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第152页。)

37) 〈陆哀的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6月29、30日，第1版。

年”，《甲寅日刊》并非在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主要同人离开的情况下而最终停的。因此，《甲寅日刊》到11月12日(269号)³⁸⁾为止仍继续发行也是理所当然的。

3. 《甲寅日刊》发行时间问题

1917年1月28日，章士钊在北京与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共同复刊《甲寅》，其形式为日刊。当时，参与《甲寅日刊》的高一涵表明：“人皆知《甲寅》日刊因复辟而停止，不知实因复辟未成而停止也”³⁹⁾，暗示了《甲寅日刊》在复辟前其内部已经存在问题，因而导致了停刊。相关的研究者们大都认为《甲寅日刊》最终停刊是在复辟之前。

具有代表性的，白吉庵认为“李大钊早于5月初回乐亭，邵飘萍也离开报社。《甲寅周刊》由高一涵支撑着，但时间也不长。刊至150号，6月19日就停刊了。”⁴⁰⁾但是，郭双林在《前后“甲寅派”考》中主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存的《甲寅》日刊看，该刊1917年1月28日创刊，到6月19日结束。”⁴¹⁾，“共出版142号(报纸排号为150号，有误)。”⁴²⁾因此，高一涵也表明了并非是复辟导致了停刊。这可能是《甲寅日刊》6月11日文中，章士钊以《章秋桐紧要声明》的形式发表了“敬启者：秋桐久已离京，与报脱离关系，特此声明”⁴³⁾的缘故，他们认为章士钊离开《甲寅日刊》，则难以继续发行。他们认为即使有发行增刊的可能性，但在章士钊离开的情况下，不具备任何意义，因而最终决定“停刊”或者“结束”。

38) 依据“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说明，“见存最后一期为no.269(1917.11.12.)”。

39)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1927年5月23日。

40) 白吉庵，《章士钊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19页。

41) 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第149页。

42) 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第148页。

43) 《章秋桐紧要声明》，《甲寅日刊》1917年6月11日，第1版。

但是，笔者直接通过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管的《甲寅日刊》缩微胶片，发现6月19日的封面确实标注了150号刊。但是，如果1月28日自创刊号开始，每日不停的情况发行的话，截止到6月19日应该到143号刊。那么也可以说，郭双林所主张的“6月19日，共出版142号”是错误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甲寅日刊》至少停刊两次。根据2月12日的〈本报启事〉：“今日为南北统一共和纪念循例休息一天，十三日无报十四号当出版此布”，⁴⁴⁾又于4月8日说明：“今日为国会开幕纪念日，本报休息一天，明日无报，十号当出版此布”。⁴⁵⁾因此无法确认“共出版142号”。

另外，笔者又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存的《甲寅日刊》，了解到：自5月1日起至5月6日期间的资料已经失传。当然在《章士钊全集》⁴⁶⁾和《李大钊全集》⁴⁷⁾中，收录了5月1、2、3、5日的〈社论〉，因此可以推测：这一时期可能应该持续发行。然而并不能够因此确定5月4、6日一定发行了。所以至今为止无法确定《甲寅日刊》的总发行刊号。

白吉庵庵说到“李大钊早于5月初回乐亭”，这正是表示了李大钊于5月初已经与《甲寅日刊》脱离关系。就其原因，高一涵表明：“谁知章士钊已早与政学系研究系相亲近，余与守常每有批评该两系主张时，士钊有难色。守常因此不再作论说”。⁴⁸⁾就这一事实，在《章士钊先生年谱》中也阐述到“李大钊与章士钊的政治见解上的分歧日深，在《甲寅》的编辑工作陷入困境。其实李大钊5月4日就离开回乡，因为夫人赵纫兰生病，决定次日回想探视，嘱他的朋友白坚武为《甲寅日刊》写稿。”⁴⁹⁾然而，白坚武表明：“约代为《甲寅日刊》作文，意绪纷冗，恐不能如愿也。”⁵⁰⁾因此，尽管5月初李大钊归省，但可以说并没有与《甲寅日刊》完

44) 〈本报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2月12日，第2版。

45) 〈本报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4月8日，第1版。

46) 秋桐，〈论同意权〉，《甲寅日刊》1917年5月1日。；秋桐，〈外交问题〉，《甲寅日刊》1917年5月3日。（《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66-70页。）

47) 守常，〈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甲寅日刊》1917年5月2日。；守常，〈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下续)〉，《甲寅日刊》1917年5月5日。（《李大钊全集》第2卷，第132-139页。）

48)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1927年5月23日。

49)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第104-105页。

全脱离关系。

在《甲寅日刊》中，这一时期关于李大钊的行迹，以〈本馆特别启事〉的形式发表了公告，表明：“本志记者李守常君近以旅行在外自有记述，所著旅行日记已于本日起逐日登载附章，阅者注意焉”，⁵¹⁾5月9日也传来了李大钊的消息。实际上〈旅游日记〉是《甲寅日刊》自5月9日至11日分三次连载的。另外，在《甲寅日刊》5月18日刊中以李大钊的〈代论〉形式刊登了〈青年与老人〉⁵²⁾，5月21日也以〈社论〉形式刊登了〈自由与胜利〉⁵³⁾。

6月11日，章士钊发表了〈章秋桐紧要声明〉后，确实在《甲寅日刊》上再难以发现他的文章。尽管如此，《甲寅日刊》并没有停刊。6月13日，高一涵仍以〈言论〉形式发表了政论文。特别是现存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的《甲寅日刊》缩微胶片中⁵⁴⁾，除了6月24日⁵⁵⁾休刊以外，保存了到6月30日(第160号)，甚至还存有从10月3日(第239号)到11月12日(第269号)的《甲寅日刊》。封面的6月30日即160号，10月3日标记了239号。

笔者尽管难以确认7月到10月初的《甲寅日刊》，但从现存的《甲寅日刊》封面上确认了160号和239号，在大概超过三个月的时间里，仅有15天停刊。7月1日张勋宣布复辟，“虽旋起旋灭，为时不过十二日，而北京报纸停刊者达十四家云。”⁵⁶⁾由此提出，《甲寅日刊》是由于复辟导致的极度的政治混乱，在这一时期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成为北京停刊的报社之一。然而，除去复辟的十二天时间，《甲寅日刊》仅仅停刊了三天左右而已。

无论如何，自创刊号开始到6月30日为止，《甲寅日刊》一直维持了其发行

50) 《白坚武日记》第二册(河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大钊年谱》，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5页。)

51) 〈本馆特别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5月9日，第1版。

52) 〈青年与老人〉，《甲寅日刊》1917年5月18日，第1版。

53) 〈自由与胜利〉，《甲寅日刊》1917年5月21日，第1版。

54) 中国国家图书馆保管的《甲寅日刊》缩微胶片是6月4日至30日(6月24日为休刊)、10月3日至11月12日(10月11日为休刊)。

55) 《甲寅日刊》6月22日和23日两次刊登的〈本报特别启事〉中说明了，“时届夏节例应休息本报，定于二十四日(即旧历初六日)停刊一天二十五日照常出版此启。”

56) 戈公振，《民国初期的重要报刊》(载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页。)

场所和发行目的。其原因首先是保证了《甲寅日刊》的发行场所。《甲寅日刊》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创刊，在创刊号的封面注明了“本社内部组织各有专司略分编辑、发行、会计、广告、收部”⁵⁷⁾等几个部门，实际上各部门的所在地也分散在北京内的各处，“总编辑部在北京前门外琉璃厂玉皇庙路西”，“发行兼广告部在琉璃厂满源夹道路东”，“分发行所在南柳巷永兴寺”等。而2月24日在《本馆迁移广告》⁵⁸⁾中公示了新闻社已迁移的通告，“本馆已于昨日迁移永光寺中街电话南局一九零六特此通告”。因此，自当日起封面均改为新的总部地址，“总编辑发行部在宣武门外永光寺中街”，直至到6月30日为止。然而，现存的自10月3日到11月12日为止的封面上，把总编辑发行部重新标注为“琉璃厂玉皇庙路西”。

其次，《甲寅日刊》不仅在表面上没有变化，作为政治报刊的性质也没有变化。《甲寅日刊》6月29、30日两天连续刊登了《陆鸿逵的启事》，内容声明了他自6月30日当日将与《甲寅日刊》“脱离关系”。因此，在《甲寅日刊》中仍可以确认陆鸿逵的存在。同时，直至6月30日也每天持续刊登《新青年》和《太平洋》的出版广告，在《甲寅日刊》的第1版上也依然刊登了《评论》形式的政论文。相反的，10月之后的第1版上没有刊登任何形式的政论文，只刊登了几条商业性广告。

另外，新闻报道的性质仍然侧重于对政治的关注，对于各种政治情况变化的政论也更多了。与此相对的，10月以后的新闻报道可以说从相对更广泛立场上反映了政治事实。

因此，在主要的同人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离开了《甲寅日刊》的情况下，到6月30日为止可以说其根本性质没有发生改变。其原因可能是，除这三个人以外，直接参与了《甲寅日刊》发行的陆鸿逵等人直至6月30日为止仍然存在的缘故。

www.kci.go.kr

57) 《本社启事》，《甲寅日刊》1917年1月28日，第1版。

58) 《本馆迁移广告》，《甲寅日刊》1917年2月24日，第1版。

4. <甲寅周刊出版預告>問題

1916年袁世凱退位，恢復國會，同時章士釗也恢復了議員的身份而暫居北京。他通過議會活動，加之《甲寅》的復活，堅持自己的政治主張。首先發行了日刊形式的《甲寅日刊》，然後為繼承《甲寅雜誌》，又計劃以雜誌的形式發行《甲寅周刊》。⁵⁹⁾

其依據是，李大釗在《甲寅日刊》創刊號(1917年1月28日)的<時評>欄上刊登的<甲寅之新生命>⁶⁰⁾中發表了“今甲寅蛻化而為周刊矣，是一周一甲寅也，是甲寅一周而有一生命也。今甲寅蛻化而為日刊矣，是一日一甲寅也，是甲寅一日而有一新生命也。此甲寅之努力也，此甲寅之進化也。”從中可以確認《甲寅日刊》發行的同時提及了《甲寅周刊》的發行問題。

不僅如此，在陳獨秀寄給吳虞的信中寫道，“《甲寅》擬即續刊。尊着倘全數寄賜，分載《青年》、《甲寅》，嘉惠後學，誠盛事也。”⁶¹⁾或者是計劃《甲寅》的“續刊”，在寫給胡適的信中寫道，“《甲寅》准於二月間可以出版，秋桐兄不日諒有函于足下，《青年》、《甲寅》均求足下為文。”⁶²⁾從中可以確定這一點。由此可以了解，陳獨秀認為《甲寅》的續刊是與《青年》類似的“雜誌”的形式。

對於這一時期《甲寅周刊》的發行計劃，白吉庵表明了“《甲寅日刊》是2月17日改為“周刊”發行。”⁶³⁾而郭雙林則指出“曾從3號至13號連續多日刊發《甲寅》周刊出版預告。然後，2月10日(也就是預告中說的《甲寅》周刊出版日)以後未再見到預告，也未見到《甲寅》周刊出版。所以，2月17日改為周刊之說更是明顯

59) 這裡所說的《甲寅周刊》，與在導論提到的1925年發行《甲寅周刊》不同，出版預告顯示，兩者的同人構成與發行意圖是完全不同的。

60) 守常，〈甲寅之新生命〉，《甲寅日刊》1917年1月28日，第3版。

61) 袁景華，〈章士釗先生年譜〉，第100頁。

62) 中國社會科學院，〈胡適往來書信選〉上冊，中華書局出版社，1979年版，第6頁。

63) 白吉庵，〈章士釗傳〉，第112頁。

错误。”⁶⁴⁾因此，笔者试分析《甲寅日刊》上公布的〈甲寅周刊出版预告〉，其内容如下。

〈甲寅周刊出版预告〉⁶⁵⁾

①本社除发行甲寅日刊外，仍发行甲寅周刊，定于阳历二月十日(2月2日以后改为‘十七日’)出版。②所有议论仍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通讯一门，尤所注重，务使全国所怀之感想，均得如量发挥。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理，抑或论人议政，皆所欢迎。③本周刊分编辑发行两部凡关于编辑及收稿事项归北京朝阳门内竹杆巷第四号一庐接洽，关于发行及广告事项归上海四马路福华里亚东图书馆接洽，④再前岁订阅甲寅诸君，有资已付而报未齐者，请开明住址函告发行部即以本周刊按照余资补足，特此宣告。甲寅社启。

首先，在①中可以了解到《甲寅周刊》的发行日期是2月10日，2月2日(第6号)以后则变更为2月17日。其事实依据是，白吉庵把《甲寅周刊》的发行日期看做是2月17日。而郭双林看到《甲寅日刊》5号刊的“2月10日”，指出是“明显错误”。事实上，由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存的《甲寅日刊》缩微胶片制作的时间久远，保存状态不好，为掌握现存的《甲寅日刊》的内容确定其事实更是难上加难。

章士钊一方面发行《甲寅日刊》，另一方面计划《甲寅杂志》的复刊，通过〈甲寅周刊出版预告〉的发行目的可以确认其原因。从②中可以看出《甲寅周刊》的发行目的是“所有议论仍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与《甲寅杂志》是同一理由。⁶⁶⁾另外，如同《甲寅杂志》的〈通讯〉栏一样⁶⁷⁾，是为了实现“其文或指陈一事，或阐发一理，抑或论人议政”。另外，正如④中说明的一样，另一个原因是考虑到之前定期购读《甲寅杂志》的人，即由于《甲寅杂志》的停刊“有资

64) 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第149页。

65) 〈甲寅周刊出版预告〉，《甲寅日刊》第3号(1917年1月30日)至第13号(1917年2月9日)，各第1版。

66) 1914年5月10日发行的《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本志宣告〉中阐明了《甲寅杂志》的目的是“本志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本志宣告〉，《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

67) “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本志宣告〉，《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1914年5月10日)

已付而报未齐者”，可以作为补充书。

章士钊认为通过《甲寅周刊》的发行，继承《甲寅杂志》，可以说展示了连续性。因此章士钊，一方面发行日刊形式的《甲寅日刊》，同时迅速地传达政界的消息，另一方面为维持《甲寅杂志》时期自身的政治主张。从结果来看，《甲寅周刊》没有发行，想通过《甲寅日刊》的一版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政治调和论”的实践。

从③中看，可以确定《甲寅周刊》由编辑和发行两部构成。北京的编辑部提及了“北京朝阳门内竹杆巷第四号一庐”，实际上是高一涵所提到的“而与守常同住朝阳门内竹杆巷。”⁶⁸⁾把《甲寅周刊》的编辑部介绍为两人的合宿场所，这一事实说明了结果编辑部的工作主要由二人来负责。但发行和广告表明计划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来负责。亚东图书馆的主人汪孟邹1916年3月10日在写给胡适的信中写道：“目前秋桐以国事奔走，未遑执笔，故暂停刊。俟大局略定，即当继续出版，且有改为周刊之议。”⁶⁹⁾可以了解事实情况。《甲寅杂志》停刊不久⁷⁰⁾，从汪孟邹计划改为周刊的事实来看，章士钊表示可以说《甲寅杂志》停刊的同时，已经有了发行《甲寅周刊》的计划。

另外，以亚东图书馆为发行所的事实表明了，《甲寅周刊》是与《甲寅日刊》不同的《甲寅杂志》的连续性刊物。可能是章士钊认识到《甲寅日刊》简短地报道消息的这一点局限性，知道杂志具有舆论形成的影响力。因而，他认为可以将其作为其追求自身政治主张的舆论的前哨基地。但是，这一时期却没有发行《甲寅周刊》。可能正如高一涵所说的，“约我们替他写社论。今天由守常写，明天由我写，后天由守常写，再后天由我写。”⁷¹⁾章士钊加入重新恢复的国会，因而疏忽了《甲寅日刊》的编辑工作。《甲寅日刊》的政论文也是不得不在以李大钊和高一涵两个人为中心编写的，因为对于《甲寅周刊》的重新发行力不从心。

68)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略传〉，1927年5月23日。

69)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第97页。

70) 现存《甲寅杂志》的最后(第10期)发行日期是1915年10月10日。

7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40页。

5. 结论

民国时期以“甲寅”为名的报刊是以章士钊为中心发行，形成了参与人员所谓的“甲寅派”。因而，“甲寅”都有政论杂志的共同点，但其发行方式分为月刊、周刊、日刊的3个形态，且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行。因此，所谓“甲寅派”并不意味着同一群体，学界应该检讨与章士钊一起参与发行的同人，检讨其追求的政论方向。郭双林把“甲寅派”分为前后两时期，主张《甲寅日刊》时期前期甲寅派才最终形成。

不过，若从其区分的节点来看，我们可以确定《甲寅日刊》时期的一些事件。笔者查看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的《甲寅日刊》缩微胶片一部，追查发行《甲寅日刊》的1917年同人之间的事件和关系。因此，笔者确认了1917年上半年，国内外的政势变化导致了其成员之间发生异见，《甲寅日刊》不能按照原来的发行意图和力量的发行，同人渐渐离开《甲寅日刊》，既往研究提到的“停刊”、或“结束”的状况。但是，笔者判断1917年6月末为止，以政论文为中心的《甲寅日刊》还是维持基本性格。且笔者确认了现存自10月3日到11月12日为止《甲寅日刊》仍然发行。所以，该事实可反映出既往研究的几个问题。

首先，《甲寅日刊》的报道资料是邵飘萍的新闻编译社提供的。本文通过《甲寅日刊》的调查，可知其成立不是众所周知的1916年、1918年，而是1917年5月1日。因此，笔者判断《甲寅日刊》是有当事人、当时记录的珍贵价值。而且，本文确认同人陆鸿逵一直到6月30日为止仍然直接介入《甲寅日刊》的发行，该报纸是在11月份刊登“陆哀”的声明。

其次，关于《甲寅日刊》的发行时间，研究者们主张报纸停刊于1917年6月19日，其理由是章士钊和李大钊之间的政治见解差异，以及张勋复辟导致同人们与《甲寅日刊》脱离关系等。然而，笔者的观点是到6月30日为止的《甲寅日刊》其政治立场没有变化，之后尽管其政治立场已经改变，但直至10月、11月仍

然在持续发行。

最后，对于在《甲寅日刊》上公告的《甲寅周刊》的出版预告，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意见存在差异，因此笔者试图探析该计划的实际具体情况。当时，《甲寅周刊》尽管未能发行，但章士钊、李大钊等有发行计划，其理由首先是与《甲寅杂志》的连续性。其次，鉴于以日刊形式简短报道事实的局限性，他们主张杂志形式的政治评论应通过更具体的论据表达和更强的逻辑性。虽然在《甲寅日刊》上登载了〈甲寅周刊出版预告〉，然而这时期《甲寅周刊》并未发行。

〈参考文献〉

- 《甲寅日刊》缩微胶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17年1月28日至6月3日)、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17年6月4日至30日、10月3日至1917年11月12日)。
- 《甲寅杂志·甲寅周刊》影印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
- 《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1日。
- 《民国丛书》第二篇49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 章含之、白吉庵主编，《章士钊全集》第1-10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
-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编注，《李大钊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近代二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胡适往来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版。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 袁景华，《章士钊先生年谱》，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 邹小站，《章士钊社会政治思想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 郭华清，《宽容与妥协-章士钊的调和论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 白吉庵，《章士钊传》，北京：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 河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李大钊年谱》，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郭双林，〈前后“甲寅派”考〉，《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
- 孙晓阳，〈关于邵飘萍的几点考证〉，《新闻研究资料》1983年6期。
- 吴家林，〈从《甲寅日刊》看李大钊的早期政治思想〉，《齐鲁学刊》1984年第5期。
- 郭华清，〈调和为国：章士钊在《甲寅》日刊时期的政治思想〉，《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

报》2003年9月。

董宝瑞, <李大钊的文坛好友高一涵>, 《党史纵横》2003年4期。

胡峰, <《甲寅杂志》(月刊):孕育《青年杂志》的母体>, 《齐鲁学刊》2009年6期。

杨琰, <《每周评论》等报刊若干撰稿人笔名索解>, 《历史研究》2009年3期。

陈友良, <民初知识分子与政论-以《甲寅》、《太平洋》为中心>,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

田寅甲, <东方文化派와 章士釗 -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에 관한 연구노트>, 《人文学研究》7集2004年。

李相九, <二次革命 이후 革命派의 분열과 欧事研究会>, 《历史学研究》58号2015年。

< Abstract >

The Issuing Process of “Jiyinrikan”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Lee, Sangkoo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Jiayin”(甲寅) was compiled by Zhang Shizhao(章士釗). After three distribution patterns, the group was called “Jiayinpai”(甲寅派). Firstly, the “Jiyinzazhi”(甲寅雜誌) was a result of 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Revolution(二次革命)”, which was issued from 1914 to 1915 by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intellectuals in Japan, becoming the most influential political magazines in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Secondly, “Jiayinzhoukan”(甲寅周刊) published in 1925 was also known as “Jiayinpai” in the academic circle, but their former colleagues were different.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新文化運動) had become the mainstream point of the ideological circle, which meant a representative of Cultural Conservatism(文化保守主義). Finally, the “Jiyinrikan”(甲寅日刊) issued in 1917 meant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political chaos at home and abroad to the history, and some of the events from the publishing to the stopping were the time points for the division of “The early Jiayinpai(前期甲寅派)” and “The late Jiayinpai(後期甲寅派)”.

However, the “Jiayinrikan” was a short issue period, because it is difficult to find information and so on, so it has not carried out the actual historical evaluation. This paper tries to find out the substantial data of Jiayinrikan and confirm the value of the data. So this paper reviews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points out several problems and demonstrates the facts based on materials.

In January 28, 1917, Zhang Shizhao returned to Beijing as a Senate to republish Jiayin, which was in the form of a daily magazine. The main political theories(政論), such as editorials(社論), monographs(專論) and commentaries(時評), were held by Zhang Shizhao, Li Dazhao(李大釗) and Gao Yihan(高一涵), and the news compiling agencies set up by Shao Piaoping(邵飄萍) provided reports on Lu Hongkui(陸鴻逵) as the issuer and Shao Piaoping. Researchers in “Jiayinrikan” believe that the newspaper stopped publication or ended when they left the newspaper in the end of the June. However, in fact,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Manchu(張勳復辟) in July 1st, only a few days after the suspension, it can resume immediately and continue to be released until November.

In February 1917,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explain their political opinions, like the Jiayinzazhi, there was a magazine publishing plan. The fact is confirmed through “A preview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yinzhoukan(甲寅周刊出版預告)”.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ntents of the “A preview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Jiyinzhoukan”, and the colleagues pursue the continuity with Jiayinzazhi through Jiayinzhoukan. However, “Jiyinzhoukan” was not issued at that time, and its tendency to pursue political theories was changed when it was actually issued in 1925.

Key Words: Jiyinrikan, Jiayinpai, Zhang Shizhao, Jiyinzazhi, Jiayinzhoukan

원고접수일	심사일정	1차수정	게재확정	출간
2018. 4. 30	2018. 5. 13	2018. 5. 24	2018. 5. 31	2018. 6. 30